

# 左宗棠传

左景伊 著



长春出版社

# 左宗棠传

左景伊 著

长春出版社



602

# 左宗棠传

左景伊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左宗棠传

左景伊 著

---

责任编辑:张中良

封面设计:王爱宗

---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17.25 插页:2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2 000

印数:1-2 500 册

---

ISBN 7-80604-155-9/K·8

定价:11.80 元



左文襄公像

# 天地正氣

右曰字湘陰在國左文襄公所書公之物業著在天  
壤書法亦為抗古無俟予言竊謂天地之正氣入  
於有之惟君子為能直泰與害全剛大而既道為假  
正氣當整乎兩間故陰不居休陽邪不得于正小人  
不得加君子外莫不得陵中國公之主手蓋皆天地  
之正氣發洩淋漓心畫亦見一魂悍覽者觸目  
在然各知正氣之在我而不可有一毫自與自汚之  
私即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公既物欲谷不傳以  
然則家公之斯世以公不忠之意且知正書亦  
當在左右間也為之跋以誌之  
三年賀正 左宗棠

左宗棠題字刻石（藏陝西西安碑林）

## ● 出版说明

62153/28

14

左宗棠是清末著名爱国将领，他为捍卫祖国统一、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纵贯 19 世纪初到 80 年代，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直到 1885 年病逝于中法战争的前线。中国近代史中一些重大事件，他都参与而且往往成为重要角色，所以这部详尽的《左宗棠传》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重要事件。

左宗棠传奇性的一生，有过收复新疆、屯田植造、养蚕兴农、修建书院、兴办船厂的业绩和辉煌；也有过镇压农民革命消极的一面。但纵观左宗棠 70 余年的人生，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芒，左宗棠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不失为一位民族英雄。

本书作者左景伊先生是左宗棠曾孙。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及浙江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兼职教授，曾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腐蚀与防护学科的研究，是我国该学科的创始人。左景伊自1983年在王震同志的鼓励下萌生了为曾祖父作传的想法，近年来在研读历史资料、参加左宗棠学术讨论会、撰写文稿的基础上，又用约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左宗棠传》。

作者特定的身份、特别的情感，以特殊的关系、特有的角度，决定了全书有特色的内容。全书特别在左公对子女的教育、家庭流传的生活轶事、子孙及亲友的情况、身后沧桑等方面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

宣传爱国主义、弘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年初，作者的妹妹、长春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左景成女士将《左宗棠传》手稿送给政协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希望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当前出书困难的情况下能支持此书的出版。文史资料委员会认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为促成《左宗棠传》的出版做一些工作，为宣传爱国主义做一些工作，这是有识者共同的不分彼此的责任。在市政协领导的关怀下，文史资料委员会做了促成《左宗棠传》出版的工作，并经和长春出版社共同商量，长春出版社决定鼎力支持该书的出版，把作者的夙愿、文史工作者的责任、读者的希望变为现实。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长 春 出 版 社  
1993年11月



# 自序

约在10年以前，我还不曾想起要先曾祖父宗棠公写点什么，更不用说一本完整的传。那时我对他老人家的生平其实了解得不多。幼时在家中书房里，有一只书柜，存放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翻阅。原因很简单，那时既看不懂，也没有兴趣。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学校里课程繁重，应付考试还来不及，有点闲暇，宁愿去看小说、电影，上操场玩玩球，也不会埋头在故纸堆中。在大学里读的是理工科，及至工作之后，对文史方面的书籍涉猎更少。1939年长沙大火，家中所有的文物书籍，包括这一套《左文襄公全集》，都付之一炬。因此长期以来，我所了解有关曾祖父的情况，只限于在历史教科书里极有限的材料和家中流传的一些故事。后来我也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其中有一些关于曾祖父的故事；还有三本专门写曾祖父的书，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有两本书我读过，还接触过其中一位作者；另一本未读过，但却和它的作者会见过。

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英文著作：《TSO Tsung Tang, Pione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llen Mill in China》（《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1936年我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那时在燕京大学任助教的表姐饶毓苏告知我，陈其田教授约我去谈谈。我如约去燕大经济系会见了陈先生，他告诉我正在写这本书，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曾祖父的资料和照片等，我答应尽力去办。1937年暑假回家，不想几天后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南迁，燕大留在北平，我和陈先生因此没有机会再接触。这本书据说1938年在北平出版，我始终没有读过它，从书题看，当是写曾祖父办洋务的事。

1939~1940年我在重庆上大学时，读到另一本英文著作，W. L. Bales的《Tso Tsung 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书中详细内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印象一般，所叙述的事实大致早已知道，也收集了一些逸闻轶事，有些显然是不可靠的。这是最早的一本外国人写的曾祖父的传记。作者是一位美国军人，书中对曾祖父给予很高的评价；也难为他读了许多中国史料，包括一些野史，在当时就算是一本较详尽的曾祖父的传了。尽管这本传不能说有什么特色，但可表明曾祖父在外国人心目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爱国英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大姑父夏敬观告知我，有一位秦翰才先生是专门研究文襄公的，想来和我谈谈，我表示欢迎。一天翰才先生到武进路我的寓所造访。他当年约50余岁，中小个子，带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说正在写一部《左宗棠传》，希望我为他收集家中流传的逸事，并提供文物照片等。他还送了我二本他的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和《满宫残照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几乎没有见他露出笑容，只是全神贯注谈他的对文襄公的研究——他的毕生的事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写了一篇曾祖父的逸事，大都是家中流

传的故事。十余天后我到他的工作地点——靠近苏州河的一家银行，去拜访了他，将写好的材料交给他，他默然地接受了。因为是在工作时间，没有多谈。以后我还想为他收集一些家中的文物照片，但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那时工作既忙，运动又一个接着一个，和翰才先生就失去联系了。那次在上海苏州河畔是我们最后的一面。直到1983年底，才听说他已于1968年含冤去世。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遗著《左宗棠逸事汇编》，我写的那几则轶事也在书中刊出了。

《左文襄公在西北》这部书，我当时翻阅过，但一直没有细读，因为后来多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与文史距离较远；当时的环境也不鼓励人们去钻研封建时代的人物，即使是自己的先辈。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细读这本书，觉得它收集资料丰富，是迨至那时比较详尽、公允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研究曾祖父的一本经典著作，可惜只限于叙述西北的事迹。

以后史学界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有名人物都被批倒批臭了，更何况镇压过农民运动的曾祖父。造反派批判我说：“你的家庭是最黑最黑！”我想，曾祖父收复新疆，为国家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今落得这样个说法，心里不是滋味。虽然我坚信历史终会恢复本来面目，但却也不敢和造反派顶嘴。当时自然不会去埋头研究曾祖父的历史。

“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中央的拨乱反正政策实施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肯定曾祖父收复新疆的重大功绩，以及为办洋务恢复名誉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杜经国先生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论文，以后陆续有董蔡时、杨东梁、沈传经、耿士信、刘泱泱诸先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笔谈左宗棠”专辑等大量文章发表，作者大多采取了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虽然其中也有些论点，主要是对曾祖

父早期活动的评价，作者并不能苟同。80年代初期，国家副主席王震公开发表了几次谈话，充分肯定了曾祖父收复新疆为中国人民立下的功劳。王老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谈话极有份量，这对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3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件麻烦，是与曾祖父有关的大事，也是他老人家死后遇到的不幸。我收到在长沙家人的来信，曾祖父在杨梅河的墓被盗了。据说是在“文革”末期的1974年，盗墓之风盛行。一位农民认为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墓中必有宝藏，因此掘开了墓，打开棺木，发现曾祖父遗体未腐，面目栩栩如生，但宝物却没有。盗墓者一气之下，就将他老人家遗体抛弃在墓旁，恨恨而去。后来有一位好心的老农民黄大爹挖了一口浅坑，将遗体放入，用浮土掩埋好。当时不要说远在外地的我，就是在长沙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八九年之后，也还是这位好心的人辗转告知了长沙的家人，我们这才知道。作为后人，听到这样的事，我们都很痛心，也很发愁。修墓要花一笔钱，我们的财力都不充裕，但还可以设法筹募。更重要的是，曾祖父是一位历史人物，社会上还有争议，“文革”遗留下的“左”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如果不得到政府的同意，私人修墓恐怕也有困难。在无可奈何之下，我想到求助于王震将军，就贸然写了一封信给王老，希望他能给以帮助，其实也是姑且试试看的意恩。

不到一个星期，8月23日晚8时许，王老派了一位何参谋来接我，到了西城区他的寓所。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刚从青岛回来，看到你的信，找你来谈谈，晚了一点了。”我听了很感动，他老人家这么忙，这么快就约见我，已经大出我的意外，他还这么谦和，也真叫我这个后辈不敢当了。他的第二句话也是开门见山，说：“左公的墓我会通知国务院转告湖南地方办理，你不用操心了。”我放了一大条心。

这晚我们就不用谈修墓的事。他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事迹

很感兴趣，对史学界近来开展的重新评价曾祖父的业绩给予重视，说：

“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作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我们后人发扬的。”

那晚他谈兴很浓，谈到曾祖父的功绩和对洋务派的评价，又谈到左公柳，兴致勃勃地吟诵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有名的歌颂左公柳的诗；还殷殷询问左公后代的情况。这些情况在我后来发表的那篇访问记中都已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直到晚 11 时许，我们的谈话才结束，临别前他赠给我一套他亲自签名批阅的《左文襄公年谱》（共 4 册），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陆已多年没有印售过这本书。他还谆谆嘱我今后多研究曾祖父的事迹。

从王老赠书以后，我这才开始用心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史料，除了《年谱》外，还较细心地涉猎有关的专著和报刊文章。由于王老曾嘱我找一找《左文襄公在西北》的作者秦翰才先生，显然他对这本书和作者很有好感。我已多年没有和秦翰才先生联系，因此征得王老同意，写一篇访问记，提一提这件事，估计会得到回应的。不久我将写好的文章寄给王老，王老作了些修改，并且将题目改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获得了意料不到的热烈反应。各地报刊和文摘报，以及港澳报纸大都迅速作了转载或介绍。我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对王老肯定曾祖父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远见卓识。海外亲友也迅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它的摘要，他们对王老所说的话都十分感奋：“要尊重历史，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

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认为从王老的谈话中，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有功人物、尊重传统文化的。王老的谈话对海内外人士和统战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后几年间，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左宗棠研究”的热潮。《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在西北》、《逸事汇编》和几本有份量的《评传》和《研究论文集》等都陆续出版。1984和1985年还分别在苏州和长沙举行了两次“左宗棠学术讨论会”，收到了百余篇论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分别作了报道。特别是1985年11月在长沙的那次会议，由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等联合主办，同时也是纪念曾祖父逝世100周年和长沙曾祖父墓修复落成。王震副主席于会议闭幕之日赶到长沙，第二日接见了大会主持人和左氏后裔中的几个代表。王老听取了大会的汇报，并指示说：“左宗棠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有功就是有功嘛！评价历史人物，帐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

我开始较认真地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历史，是在王老赠书之后，当时并没有要写点什么的想。后来应《湖南师大学报》和长沙“左宗棠学术讨论会”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和一篇较长的文章，又亲自参加了长沙的会议，听到许多代表的发言。几年来还读到许多报刊文章和几本新出的评传和专著，因而萌生了为他老人家写一部较详尽、完整、客观、更为符合史实的传记的意图。写《左宗棠传》的目的有下列几个：

(一)曾祖父的一生纵贯19世纪20到80年代。从青年时起，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直到1885年病逝于中法战争前线的福州。中国近代史中一些重大事件，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角。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织，特别是西方列强侵略、压迫、



瓜分的危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曾祖父一生中，与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以及国内投降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收复了沦陷于英俄走狗安集延匪帮 13 年之久的新疆，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曾祖父战斗的一生写一部翔实、详尽、公正、客观的传，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现在海内外还缺乏这样一部优秀的传，如果能写成功，它将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教材，一部简明的中国近代史。对于培养和发扬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是十分有益的。

(二) 通过阅读大量曾祖父本人的著作和同时代和后代人有关他的生平的介绍和评论，我感到虽然近年来史学界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对若干问题重新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功劳和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思想，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正如王震副主席所说，是史学界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可以搞清的，偏见也不是立时可以消除的，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更非几次学术讨论会就能解决。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写一本曾祖父的传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可能有助于澄清近代史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曾祖父的一些史实，特别是某些流传广泛、众说纷纭的问题，如他在太平军革命早期和晚期的思想转变，他和胡林翼、曾国藩结成湘军核心(联盟)的意图和后果，他和洪秀全会见之谜，他和曾国藩交恶的内幕等，书中阐述了作者经过仔细研究后提出的见解和推断。所有书中的论点，包括作者自己的和引自众多史家评家的，自然不免会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我想，即使引起一些争议，百家争鸣，对于推动近代史的研究，也将是有益的。

(三) 自幼在家中常听到长辈和兄妹们谈到曾祖父的趣闻轶事，有若干在外未曾流传，对于了解曾祖父的生平也是可贵的史料。还有，关于曾祖父的身后、子孙和亲友的情况，一位伟人的后

代是如何生活和逐渐凋零的，等等，也可能会使人们感兴趣，也有借鉴的意义。所以，想以“传”的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史料”都记录下来，否则就会流失了。

1991年初我开始着手《左宗棠传》的准备工作，草拟了提纲，分了章节，广泛搜阅了有关书籍文章，准备工作花了半年，原计划写十六、七万字，20余章。从1991年7月开始写，写下来却止不住，许多重要的内容不能割弃。约一年后完成了初稿，已有了较大的扩充。又经过几个月的修改补充，今年6月14日全稿完成，共70章，约三十五、六万字。完稿的那天，我十分高兴，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曾祖父是于民族国家有大功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却又议论纷纭，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写他老人家传的目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此，虽然一般文学传记允许有合理的想像，甚至一些虚构的情节；即使是严格的史传，也未必每件事、每句话都有可靠的根据。我写这本传虽然也以文学传记的形式来写，但严格地尊重事实，力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所有重要史实，以及传主和同时代人的活动和言行，都根据可靠的史料，不作任何虚构。书中所记曾祖父和同时代人的谈话、通信和活动，都分别引自他们的《书信》、《家书》、《诗文》、《奏稿》、《批札》、《日记》、《年谱》，以及《清史稿》和其它可靠的史料。谈话、书信和奏稿等一般都照录原文，遇到比较生涩的文言文，则改译成白话，以便利读者阅读。书中还引用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大量近、现代人著作中的材料，以及一些政治家、史学家和舆论界（包括西方）的有关评论，如严复、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王震、包尔汉、埃德加·斯诺和许多史学家的精辟论点。本书在叙述中，尽可能罗列事实，和传主及同时代人的言行，少摆或不摆观点，让事实本身作出结论。在众多的史家评论中，既有赞扬，也有批评指责，书中都如实反映。作者本着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相信众多的读者都能和作者一

样，会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中，对比分析各家的议论，得出自己的观点。

读者如有兴趣查阅原文，可从附录的书目中查找。史实和当时人物的言论和活动可以按照时间从《年谱》、《书信》、《奏稿》等史料中查出。各家评论一部分可从评家专著中找到，没有列专著的众多评家，则可从列出的几种研究、讨论论文集，以及《笔谈左宗棠》、《左宗棠逸事汇编》等书中找到他们的原文，只有一些零星散见的资料，未在参考书目中一一列出。

在引用的众多资料中，有几本书值得特别提一提。一本是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刊，即1897年），这本书收集资料较丰富，对曾祖父的生平事迹、家庭教养、师友渊源、理想抱负、思想人格，以及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侵略、收复新疆战役等方面，都有较完整的叙述。有些是第一手材料，基本上客观、公正、翔实，这样一部按年月日编排的史料，可作为写《左宗棠传》的基础和提纲。当然，清代人的著作不可能要求它具有现代人的观点，还需要大量的删节和增补。不过《年谱》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材既慎重，又大胆，也有远见，很是难得。例如在太平军初起义时，曾祖父曾抱着中立的态度，隐遁深山，多次谢绝清政府的邀请；又如太平军入山寻索曾祖父，《年谱》都秉笔直书，这些在当时对谱主是不利的，而近代史家却又几乎从不提及这类有关曾祖父早期政治思想动态的重大事件。又如《年谱》中详载了曾祖父与李鸿章塞海防之争、与沈葆楨借洋款之争、与郭嵩焘割地议和之争等等，作者显然站在谱主一方，对方却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特别是李鸿章当时还健在，而且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年谱》作者的目光和勇气是可敬佩的。《年谱》也有缺点，不仅在若干观点上，在史料上也有许多疏漏，如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是当时一件大事，《年谱》却只字不提，这可能是因作者碍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两家情面，也许是他独具慧眼，已觉察出“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不同于寻常的失和，可能还有内幕，也很